

中医古籍训诂研究

钱超尘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玉文
封面设计 徐树平
技术设计 荀新馨

中医古籍训诂研究

钱超尘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四川南充日报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30千字

1988年5月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4115·107 定价: 2.80元

ISBN 7-221-00322-X/R·26

序

陆宗达

中医学与训诂学同为我国传统科学之瑰宝。我国古代医药典籍，皆以文言写成，要读懂这些古书，一定要借助训诂。我和超尘讲过这样两个例子：其一，一九七三年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记载：“肩以脱，臑以折，是肩脉主治。”“以”即“似”。新《辞海》修订本据清胡培翬《仪礼正义》解“臑”字为“牲畜的前肢”，此解无法说明“臑以折”的含义。《说文》解释得很清楚：“臑，臂羊矢也。”臑穴在人的肩臂处，故引申为“人臂”。《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之语。“臑以折”之“臑”，正指“人臂”。新《辞海》解作“牲畜的前肢”，则又是“人臂”义的再引申了。其二，《素问·生气通天论》“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唐王冰训“足”为“丁生于足”，解作脚上生疔疮。其实，“足”与“多”同义。《左传·桓公五年》：“社稷无陨，多矣！”《成公十六年》：“我若退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这两个“多”字，都作“足”讲。可见“足生大丁”，指恣食油腻厚味，多生疔疮。

我国的训诂学，是为解释古代文献的语义而设的。自清代汉学家使它脱离经学独立以后，它的实用范围便扩大了。

整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典籍，训诂学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训诂学应用于中医典籍，正可以在这个学术领域里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体现自己的实用价值，并在其中促进自己的发展。

超尘此书，运用训诂学原理，究研和阐述了中医古籍的训诂特点、方法、成就和历史发展，不但扩大了传统训诂学的应用范围，而且对于研究和整理中医古籍，也是很有意义的。

训诂应用于中医古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象本书这样，使训诂学与中医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面系统地论述医籍训诂的历史发展，总结其经验，指陈其得失，尚不多见。我认为，此书在这方面确有首创之功。

作为一个训诂工作者，我希望中医界有更多的人致力于训诂的研究，这不但可以进一步促进训诂学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医学的继承发展与提高，也是必要的。

目 录

序.....	陆宗达 (1)
第一章 训诂	(1)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1)
第二节 中医古籍训诂概说.....	(11)
第二章 训诂的核心——解释词义	(21)
第一节 解释词义的方法.....	(24)
一、因形求义	(25)
二、因音求义	(31)
(一) 探求本字本义	(34)
(二) 探求音义关系	(50)
第二节 解释词义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54)
一、词义有古今	(54)
二、在上下文中确定词义	(56)
三、词义的社会性	(60)
四、慎言通假与“字误”	(64)
五、注意医籍词义的某些特定含义	(68)
第三节 常用训诂术语.....	(75)
第三章 中医古籍训诂史略	(84)
第一节 马王堆医书在训诂研究上的意义.....	(85)
第二节 《小针解》与《素问训解》.....	(93)
第三节 陶弘景与本草名物训诂.....	(102)
第四节 《太素》的训诂成就.....	(112)

第五节 唐代医籍的训诂成就	(123)
一、王冰与《素问》注	(124)
二、唐代本草学的名物训诂	(137)
三、梅彪与《石药尔雅》	(140)
第六节 宋、元、明医籍训诂发展概况	(144)
一、林亿	(146)
二、宋代本草学的名物训诂	(156)
三、成无己	(163)
四、李时珍	(174)
五、方以智	(216)
第七节 日本江戸时期的医籍训诂	(227)
一、多纪父子	(227)
二、山田宗俊	(235)
三、伊藤子德	(237)
第八节 清儒对医籍训诂的贡献	(242)
一、顾炎武	(243)
二、戴东原(附沈彤)	(249)
三、段玉裁	(253)
四、王念孙、王引之	(261)
五、朱骏声	(271)
六、顾尚之	(276)
七、胡澍	(283)
八、俞樾	(285)
九、孙诒让	(290)
十、于鬯	(298)
后记	(304)

第一章 训 诂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训诂”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传统语言学通称“小学”。“小学”包括三个部分：以研究汉字形体为主的称为文字学，以研究音韵为主的称为音韵学，以研究词义为主的称为训诂学。“训诂”这门学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古书里已有不少词义训诂，它们存在于正文当中。《经籍纂诂》凡例说：“经传本文即有诂训。”比如《孟子·梁惠王下》：“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这里的“畜君者，好君也”，就是正文里的训诂。赵岐注：“言臣说（悦）君谓之好君。何尤者，无过也。”赵岐注实际上是对句中训诂“畜君者，好君也”的解释申述。经过正文的词义训释，“畜君何尤”这句诗的意思就显豁明白了：喜爱国君有什么过错呢？这里我们应该附带说明：“孟子为什么训“畜”为“好”，训“尤”为“过错”呢？原来，在上古音里，“畜”与“好”的声音很相近，所以可以用“畜”代“好”。“尤”与“讎”同音，《说文》：“讎，罪也。”段玉裁注：“邶风毛传：讎，过也，亦作邨。释言：邨，过也，亦作尤。孟子引诗畜君何尤。”关于“畜”之训为“好”，清焦循《孟子正义》引王念孙《广雅疏证》云：

《说文》媯，媚也。孟康注汉书张敞传云：北方人谓媚好为媯，畜与媯通。《说文》媚，悦也。故媚好谓之畜，相悦亦谓之畜，亦谓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悦而言。故赵氏注云：言臣悦君谓之好君。好、畜古声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统》云：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孔子闲居》及《坊记》注并云：畜，孝也。《释名》云：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悦好也。畜、孝、好声并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泮水者，洪水也，皆取声近之字为训。后世声转义乖，而古训遂不可通矣。

段玉裁在《说文》女部“媯”字注及田部“畜”字注，亦有类似论述，均谓“畜”为“媯”之假借，而“媯”与“好”亦属音近之字，故可训“畜”，为“爱好”、“喜好”之“好”。

《左传·桓公六年》的一段文字，也有正文中的训诂：

（季梁）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癯蠹也，谓其备腍咸有也。”

正文先举“博、硕、肥、腍”四字，下面分四句话解释这四个字的含义。段玉裁很重视古书正文的训诂，他认为，只有能够看出这种行文特点，才能更准确地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他说：

按季良以民力溥存释博，以硕大蕃滋释硕，以不疾癯蠹释肥，以备腍咸有释腍。（见《说文》“瘞”注）

有时正文训诂不直接解释词义，而是揭示句子的含义。《大学》有这样一段文字：

诗云：瞻彼淇澳，蒹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

修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这些例证说明，训诂知识的运用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

关于正文中的训诂，过去人们论述得不多。当代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对这种语文现象作了很好的分析：“过去的学者，总认为训诂学的内容，只存在于训诂专书和大批古书的传注当中，而忽略了在古书正文里蕴藏着的许许多多实质上是训诂的宝贵材料。这些材料是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存在于正文当中的，它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不容易被一般人注意。这种用解释词义、阐明语法的训诂方法，不但可以避免在文外加上笺注的支离破碎的毛病，有时还可以起到条目分明、渲染周到的积极作用。”又说正文中的训诂，“应当看成是祖国语言的妙用，表现了祖国语言结构的丰富多采；也可以说，这就是训诂方法的灵活运用。”（《训诂浅谈》）

“训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那么“训诂”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现存的史料分析，它最早当出现于战国之末西汉之初。清钱大昕把“训诂”一词出现的历史追溯到西周时代，是不可信的。

钱大昕说，“诂训”也可以写作“古训”，“古训”最早见于《诗经·大雅·蒸民》。该诗记述周宣王时代有一位大臣名叫仲山甫，他有许多美德，其中之一是“古训是式”。钱大昕申述道：“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钱大昕据此把训诂的历史上溯到西周。

钱大昕的解释是不妥当的。考“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训，道。”郑玄笺：“故训，先王之遗典。”孔颖达疏：“古训者，故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也。”仲山甫能够遵循先王遗留下来的典册行事，而不擅乱旧章，所以堪可嘉美。此“古训”是个偏正词组，不是名词“故训”，钱氏说不可从。

又考《尚书·周书·毕命》亦有“古训”之语：“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孔安国传：“惟有德义，是乃大顺。若不用古训典籍，于何其能顺乎？”孔颖达疏：“惟能用德，惟能行义，是乃为大顺德也。若不用古之训典，则于何其能顺乎？欲令毕公以古之训典教殷民也。”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均以“古训”为“古之训典”和古之典籍，而不解为“故训”或“诂训”，其意与“古训是式”正同。

“古训”又见《尚书·商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孔安国传：“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同篇又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孔传：“事不师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说所闻，言无是道。”观原文与孔传，“古训”仍是古代的遗典，而非“诂训”。

汉末名医张仲景《伤寒论·自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古训”，亦非“诂训”。“古训”与“众方”相对而言，正谓古代之遗典。

“训诂”又写作“故训”，始见于《毛诗故训传》一书。据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

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受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萇。”而《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条云：

“汉毛亨传”，则毛亨为六国之鲁人，至汉初犹存，故又曰汉毛亨。则“诂训”一词，当始于战国之末，西汉之初。

“训诂”、“诂训”、“故训”其义相同。《经典释文》云：“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然前儒多作诂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纯注《尔雅》作释诂，樊孙等《尔雅》本皆为释故。”可见“诂训”与“故训”无别。据此，为古书作传注和词义训释的专门学问，在战国之末和西汉之初已经出现，并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了。

从战国之末西汉之初，到清代末年，我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训诂学家，也出现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训诂著作。那么，能否给“训诂”下个定义，指出它的含义呢？

让我们先看一看前人是怎样解说“训诂”的吧。

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汉书·艺文志》）

按：“尔雅”不是指《尔雅》这部书。清方东澍《汉学商兑》卷中之下说：“故，即训诂也。雅，正也。尔，近也。言此诂近正也。古文近正，所以可贵。”尽管方东澍对清代汉学家持有偏见（其中有一部分见解是可取的），但他对“尔”、“雅”、“故”三字的解释还是可从的。“故”指“训诂”（不是复句中的连词），它的主要作用是“解古今语”而使之“可知”，这样才能够使古文读起来“近”和“正”。在班固看来，“训诂”是解释古今之语的一门学问。

“五经无双”的古文学家许慎（字叔重）的解释是：“诂，

训故言也。”也就是说，解释古代书面语言的学问称为训诂。对于许慎这个定义，清儒主要有两种解释。段玉裁说：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钱大昕则认为，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学者，把许慎“诂训故言也”断为“诂，训故言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应该这样断句：“诂训，故言也。”他之所以这样断句，是因为他发现《说文》有一个“连上篆字为句”的条例。比如“参商星也”，如果在“参”下断句，则为“参，商星也”，而“参星”与“商星”迥然不同。它的正确读法是：“参商，星也。”钱大昕说：“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以亭林之博物，乃讥许氏训‘参’为‘商星’，以为昧于天象，岂其然乎？”根据“连上篆字为句”的条例，他认为《说文》下述解说，均当如此断句：

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昧爽，旦明也；肸响，布也；湫隘，下也；豚嘉，善肉也；燧燧，候表也；诂训，故言也；颡痴，不聪明也；参商，星也；离黄，仓庚也；鸛周，燕也，皆承篆文为句。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当连上篆读。草部藪、藪、蔞、蔞诸字，但云草也，亦承上为句。谓藪即藪草，藪即藪草，蔞即蔞草，蔞即蔞草耳，非草之通称也。莢、葵、菹、蕒、薇、葍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读，谓莢即莢菜，葵即葵菜也。今本《说文》莢字下云莢菜也，此校书者所添，非许意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连上篆字为句》条）。

• 钱氏创“连上篆字为句”说，段玉裁创“篆下复举隶字说”，谓每篆之下皆复举一隶体，后人删之。有删之未尽者；有删之仅存者；有不当删而删者。参见莢、藪、蔞、蔞字注。其说与钱异，而大旨略同。

依钱大昕之说，“诂训”就是“故言”，也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解释这些古代的书面语言，称为“诂训”或“训诂”。

清马瑞辰亦云：“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

总之，段玉裁和钱大昕对于许慎“诂训故言也”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训诂是解释古代书面语言的学问，他们的分歧仅在句读上。

在许慎以后，魏张揖对“训诂”也有界说。据《经典释文》引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语也”，而解释这些“古今之异语”，正是“训诂”的工作。张氏所说，与许慎所解大旨相同。

晋郭璞《尔雅叙》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在他看来，“诂训”的重心在“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尔雅·释诂》第一条注）

唐初孔颖达《毛诗诂训传》疏对“诂训”作了如下的解释：“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词，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孔氏认为，《毛诗诂训传》之“训”与“诂”，意义微有区别。孔颖达又指出：“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而为诗立传。”而《尔雅》之《释训》多言形貌之词。清郝懿行《尔雅义疏》说：“然则释训云者，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叠字，累载于篇。”孔颖达限于疏家之体，依《尔雅》之《释诂》、《释训》的内容，解释“诂训”的含义。与班固、许慎、张揖、郭璞不同者，在突出

“辨物之形貌”。而“辨物之形貌”，同样是解释词语的含义，与“通古今之异言”，没有实质的区别。所以，孔颖达的界说，与前人所说，并不抵触。

唐宋以后，关于“训诂”的释义，与前人大体不殊。

综括以上各家解释，关于训诂的定义，可以作如下表述：训诂是以解释古代书面语言的词义为主的一门学问；它虽然也涉及语法、修辞、句读等语文现象，但是，它的核心仍然在解释古书的词义上。

训诂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书面语言。在清代以前，训诂着重研究先秦两汉古书的书面语言。近几十年来，训诂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研究的范围上，都正在扩大，并且有向专业性古籍发展的趋势。

在乾隆、嘉庆以前，训诂基本上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训诂专著，但它们撰写的目的仍然在于解经。所以《尔雅》在“十三经”中，作为解经之辅翼。清代乾嘉时期，古音学的发展，促进了训诂考据学的发展。一些学者继续从事注经的工作（清儒对“十三经”注疏已经感到不满意了，他们要重新为经作疏，而且不限于十三种。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陈奂的《毛诗传疏》等就是清儒重新作疏的成果），把训诂知识广泛地运用于疏解中，从中体现他们的训诂修养与成就。他们所作的训诂工作，仍然没有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另一些学者，则致力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他们广搜博取，不拘一经，探讨语音与词义的关系，本义与假借义的关系，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词义与语言环境的关系，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名物与声音的关系，等等，涉及的范

国是那么广阔，确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戴震指出，研究词义是不能脱离语音的：“训诂声音，相为表里”，亦即互相依存。他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重要问题，曾作《转语》二十章。他说：

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然，莫究所以。今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戴震文集》卷四《转语二十章序》）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云：

十二年（按：乾隆十二年），丁卯，二十五岁。是年，仲春，成《转语》二十章。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四。于是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先生谓犹缺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缺。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玉裁按：此于声音求训诂之书也。训诂必出于声音。惜此书未成。孔检讨广森序戴氏遗书，亦云未见。

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恢宏师说，在训诂理论上又有许多发展。比如关于词义的研究，段玉裁指出：

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其失也蔽。（《经韵楼集》卷一）

王念孙通过《广雅疏证》，揭示声音与词义有密切关系。学习训诂的人，固然需要研究《说文》，多识文字，但是，如果不能把许多字词按照一定的方式统辖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且努力寻找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如同满屋散钱，而无有穿之者。王念孙根据“就古音以求古义”的理论，摸索出研究词义系统的途径，以及破假借而读以本

字的方法。这些研究工作，已经摆脱了孤立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状态，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着训诂研究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训诂研究，到了乾嘉时期，已经向“训诂学”方向前进。当时的一些杰出的训诂学家，在训诂理论上，均有建树。他们的训诂实践与训诂理论，为我国“训诂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述训诂的对象、内容、方法、沿革、成就、局限、著作及有关学者，展望其发展方向等，是“训诂学”应该完成的任务。

具有我国传统语言学特色的“训诂学”，目前仍在研究、探讨和努力建设中。

我们这里要附带指出，我国传统的训诂，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烦琐的一面。这是一个突出的缺点。

汉人训诂尚简洁而鄙烦琐。《汉书扬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汉书·儒林传》：“（丁）宽至雒阳……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又《刘歆传》亦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毛亨《毛诗故训传》以简明著称，郑玄三礼注、王逸《楚词》注、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淮南子》注，都很简明扼要。但是，汉代也出现了烦琐的学风，说一字动辄数千言甚至几万言，读者读注而忘原文，这种流弊在汉代亦较严重。《汉书·艺文志》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秦汉博洽多闻的学者读书，知“存其大体”或“训诂通而已”，不斤斤拘守于章句之间，因而学问日进。另外一种学风

则不然，他们“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对汉代的烦琐学风和章句之学，是抱着严厉批判态度的。因此，当我们讨论两汉训诂的发展与成就的时候，应该把“训诂”与烦琐的章句之学区别开来，两汉训诂学家的主流还是尚简明而鄙烦琐的。

六朝而降，义疏之学勃兴，它一方面汇集了当时经学家的研究成果，另方面也把训诂之学与章句之学杂揉在一起，显得十分臃肿而庞杂，烦琐之弊，当然不可避免。唐初诏令孔颖达撰著五经正义，孔氏博综前代义疏之学的研究成果，或有取舍，或断以己意。自五经正义撰成，而六朝义疏之学渐次亡佚。五经正义在保存经学研究成果、统一经学研究思想等方面，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从训诂学的角度上看，它几乎肯定了六朝以来训诂逐渐走向烦琐的合法性。清人训诂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亦不免烦琐之弊。《四库提要》称清代考据与训诂“其弊也琐”，是切中要害的。当我们研究我国传统的训诂之学的时候，要继承它释义简明扼要、言简意赅的优良传统，扬弃它烦琐考据的弊端。

第二节 中医古籍训诂概说

人们通常说：“中医古籍，浩如烟海。”据最近统计，

* 颜师古注“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云：“言其烦妄也。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